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博学·史学系列

X I F A N G S H I X U E S H I

西方史学史

(第三版)

张广智◎主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博学
博学·史学系列



西方史学史

第三版

张广智◎主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史学史/张广智主著. —3版.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2
ISBN 978-7-309-07060-6

I. 西… II. 张… III. 史学史-西方国家 IV. K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15352号

西方史学史(第三版)

张广智 主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史立丽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上海浦东北联印刷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6.5
字数 480千
版次 2010年2月第三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60 701—65 800

书号 ISBN 978-7-309-07060-6/K·271
定 价 3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XIFANGSHIXUESHI

本书系统阐述起自古希腊迄至现当代的西方史学，纵贯西方古典的、中世纪的、近代的和现当代史学的发展历程。古典部分，阐述古代希腊罗马史学及其对后世的深刻影响；中世纪部分，阐述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前的史学，并对其作出历史评价；近代部分，阐述西方各国史学的发展演变，涉及各种史学流派与思潮；现当代部分，阐述20世纪的西方史学，主要是西方新史学的发展进程及其在当代的新趋势。本书留意考察西方各个时期的史家、史著、史学思潮和流派等，以揭示西方史学的新陈代谢，突出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

本书结构严谨，脉络清晰，叙述畅达，深入浅出，便于广大读者阅读，可供高等院校历史学专业与相关系科教学使用，也可供历史研究者和历史爱好者参考。

本书先后被教育部列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荣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并被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定为“推荐教材”。



前 言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西方史学史》，是十年前出版的同名书的第三版。如今，新版的修订工作，经各方努力，通力协作，总算告竣。在这本“‘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付梓之际，作为一直主持该项工作的我，有些话还得向大家交代一下。

本书缘起于1996年国家教委实施的“高等教育面向二十一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其后，由我开设的《西方史学史》课程也被列入复旦大学“本科面向二十一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研究计划”。因此，编纂一本西方史学史便成了实施上述两项计划的“主干工程”。经努力，此项“工程”终于如期完成，作为国家教委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西方史学史》的初版于2000年问世。

回溯十年前本书初版问世后的情景，如今还历历在目，令我感奋不已。用现在的一句时髦话来说，书上市后“一炮打响”。不是吗？2000年伊始，新书甫出，即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不久便重印，以后又逐年不断加印。不久，本书荣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并被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定为“推荐教材”。

稍后，本书又有幸被教育部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于2004年出了第二版，销量继续走俏，继续得到读者的厚爱。为了回报广大读者，我对第二版作了许多修订工作，扩充了内容，新增若干章节，同时配置了近百幅插图，以增添视觉印象，让大家更喜欢阅读。据不完全统计，两版合计共印了十五六次，其发行量已大体覆盖需用此类教材的全国各高等院校。

这令我感到十分惊喜，当然也让我感到欣慰。

与此同时，学术界对此书也迅速作出了回应，是书出版的同年，《世界历史》、

《史学理论研究》等国内权威刊物上便发表了两篇长篇书评：张耕华教授撰《一部“经院式”的西方史学史——读张广智：〈西方史学史〉有感》^①，评价本书是“迄今为止国内最为完备的一本西方史学史教材”，是把“教材的写作与学术研究进行完美结合的著作”；徐善伟教授撰《努力建立西方史学史研究的中国学派——评张广智等著〈西方史学史〉》^②，同样认为本书既是一部“优秀的教材”，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学术著作”。

总之，教育领导部门如此重视与支持本书，学界同仁如此赞扬与推崇本书，尤其是广大读者如此厚待与关注本书，这成了一种无形的力量，有力地鞭策与鼓舞我们努力奋进，永不止步，不断修订这本西方史学史教材。

两年前，本书再度入选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这已经是第三次入选国家级规划教材了。于是，如何把新版修订好，便成了近年来一直萦绕于我心头的一件大事。我以为，新版应当继承前两版的优点，同时克服其缺陷。这之前所发行的两个版本深受读者欢迎，自然有它的道理：本书初写时所拟定的宗旨，即“编写出一部具有先进性、适应性和有特色的西方史学史教材”，满足了读者的学习需要和心理诉求。这是因为，唯其“先进性”，才能引领潮流，指明方向，尤其为向往时尚、前卫的年轻读者们广泛接受；唯其“适应性”，才能找准主体，兼及其他，使之满足方方面面的需求；唯其“有特色”，才能区别良莠，分出优劣，从而在“群雄纷争”中胜出。

因而，不断的创新，应确定为本书修订工作新的永远的追求。为此，它既要继续贯彻上述之宗旨，又要不断地创新，才能达到“先进性、适应性和有特色”的目的。

也因此，新版的修订工作特别留意以下一些方面：

尽量把国内外学术界相关的学术成果，吸纳到本书中，并及时将这些成果介绍给读者。比如，新文化史及其最新作品、现代汉学（中国学）、当代国际显学拜占庭学等，无论从所述内容还是从援引的相关注释中，读者都可了解当今国内外顶级的专著，从而获知相关方面的最新研究资讯与学术动态。

尽量把西方史学研究者的新成就与新思考介绍给读者，抛弃陈说，阐发新论。比如，关于古典希腊史学、近代初期的西方史学、19世纪西方史学、后现代主义史学等相关章节，都是几位执笔者近几年来潜心研究的成果，他们都有专

^① 载《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

^② 载《世界历史》2000年第5期。

著、专文发表过，在本书中“集体亮相”，易于广大读者“集中观看”，省时又省力。

尽量开掘与深化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内涵，以逐渐构建西方史学史教材的新体系。与前两版相比，本书扩充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容，加大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叙述力度，新添了中外史学交流的篇章，我们的这些尝试或可有益于西方史学史学科内涵的深化。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总之，在本版中，我们尽己所能，在立论、内容、结构、文字等方面修订增补，力求精益求精，使它不仅成为一本读者喜爱的西方史学史教材，也力求为有志于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学者提供门径。

在此，有一点需要点明，细心的读者当然会发现，本版的作者队伍显然扩容；更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扩容的几位也都是我的学生。我常常这样说，我的事业在于我的学生，个人的能力与精力都十分有限，因此我的许多事情都还得靠弟子们的支撑。对此，我是心存感激的。如这次修订本书，参加者有的在海外访学，有的忙于行政事务而“日理万机”，有的于书桌旁一面写作而一旁婴儿正嗷嗷待哺，一言以蔽之，他们无怨无悔，夜以继日，全力以赴，精诚合作，终于助我完成了新版的修订工作。

这使我自然回想起，耿淡如师当年为编纂西方史学史、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奠基时的艰辛，每每想到这里，都不由使我感慨万千。现在，我们的条件较之往昔不知好过多少倍，这也促使我的学生们得到了迅速的成长。本书只是收录了少数几位弟子的成果，其实，平心而论，我所带教的三十位左右的博士研究生，多已成才，且都各有所长，在西方史学史等领域内辛勤耕耘，成绩不凡。在我看来，是改革开放的时代造就了他们，是复旦这座百年名校的沃土哺育了他们，更是具有深厚的史学史研究传统的复旦历史系培养了他们。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取决于他们自身的努力。

在这里，我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我和我的学生们的成就，都离不开耿师的“精神指引”。我曾经在接受学生的一次访谈中说到，我把耿师对学问的执著与敬畏、睿智与识见，视作一座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的“灯塔”。至于我个人，作为这些后辈的老师，只是为他们的成长尽了绵薄之力。我所做的工作，好比是排球比赛中的“二传手”，经我之手，他们个个与吾师的学术文脉相衔接了。于是，在不少场合，常有学界同仁把我和我的弟子们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称之为“复旦学派”（或径直唤作“耿淡如学派”），这一说法能否成立，还得由时间来检验，让历史来判断，我和我的学生们，只不过在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和史学史这个领域做了

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而从不敢以什么学派自诩。不过,在新版即将出版的时候,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我没有让我的老师失望,我的学生们也没有让我失望。

常言道,“十年磨一剑”。这部教材从问世至今已十年了。如今看来,它仍有不少缺陷,还需要继续修订,才能打造成一把“好剑”。我深知,一部好的教材只有不断修订,才能继续得到读者的喜爱。在这里,国外的一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比如1950年初版的美国历史学家R·R·帕尔默等著的《现代世界史》^①,迄今已六十年了,其间不断修订,现已推出最新的第10版,被学界称为登上世界现代史学术殿堂的“标准教科书”(何兆武先生序语)。这就是说,该书平均每六年就推出一个新版本,并持之以恒地一直在修订着。他们积六十年之力,终于磨出一把“好剑”,这确实令我们感动,也是我们学习与借鉴的榜样。

总之,“标准的教科书”离我们很远,但又很近。倘若懈怠,满足已有成绩,它当然会远离我们而去;倘若我们辛勤劳作、努力耕耘,一切从零开始,它也许会逐渐接近我们的。“标准的教科书”,永远的新追求,这是我们今后孜孜以求的努力目标,永不迷失的前进方向。

张广智

2009年8月

于复旦大学历史系

^① R·R·帕尔默等著:《现代世界史》,何兆武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

一、承上启下,指点门径

史学史是历史学科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即所谓“历史的历史”。史学史以历史学自身作为研究对象,其主要任务是探究历史学科的发生与发展史,揭示它的演变规律,预测它未来的发展方向。

据此,西方史学史以总结与评价西方史学的发展进程为宗旨,研究西方史学发生与发展的历史,研究人们(主要是历代史学家)对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所作出的种种思考,从而在西方历史学发展的长河中,疏凿源流,抉隐钩沉,辩证因果,探求原委,以寻取西方史学自身发展的规律。

一般说来,史学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包括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史料学、史学方法论等,西方史学史亦不例外。但在这几者之中,应当突出史学思想的主导地位。就我们看来,史学思想应当论及历史学家对历史发展客观进程的认识,它大体表现为历史观;还应当论及历史学家对历史学这门学科自身的认识,它大体表现为史学观。简言之,历史学家对历史和历史学的认识与解释,应当成为史学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从西方史学发展的大势来看,一般说来,在20世纪以前,西方史家多致力于研讨历史发展的进程问题,因而如历史倒退论、历史循环论、历史进化论等都一一面世。众多历史学家(包括历史哲学家)的论见,各自从一个方面触及历史科学的某些根本问题,其中不乏闪光的睿智和启人肺腑的历史认识,为人类思想宝库留下了许多有益的资料。20世纪以来,在风气大变的西方史学的发展中,注重探讨历史学自身的问题已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倾向,于是史学流派与史学思潮纷起,诸说并存,互争雄长,看来是与这种重视对历史学自身进行反思的观念有关的。这一史学情景,大别于20世纪以前的西方传统史学。

我们讲授西方史学史,就应当突出上述这些内容。当然,西方史学史不等同于史学思想史(或历史哲学史)。在这里,值得留意的一点是,不能把西方史学史

等同于历史编纂史,不能把西方史学史搞成史家评传或书目答问之类。正如当代英国史学史家巴特菲尔德所指出的:“如果人们把史学史归结为一种纯粹的提纲,如同另一种的‘书目答问’,或把它编纂成一种松散的编年形式的历史学家的列传,那么它将是一门很有限的学科了。”^①传统的史学史作品,似有一种偏重于历史编纂学的倾向。在我国,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曾饮誉史坛30年之久,对后世中西史学史的编纂甚有影响,但此书正如作者所言:“只就过去三千年间之若干史家、史籍加以编排叙述,殊不足以说明祖国史学发展演变之主流所在。”^②金氏的体例明显地受到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类解题书目的影响。因此,这种书目答问或史家列传式的写法在我国是有历史传统的。在西方,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美国历史学家巴恩斯的《历史编纂史》,还是40年代初出版的另一美国历史学家汤普森的《历史编纂史》(中译为《历史著作史》),都十分明显地存在把史学史的研究等同于历史编纂史的倾向,前书尤甚。

史学史的研究是一种承上启下的工作。学习西方史学史,对历史学科的自身建设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说历史学家是为历史作总结的话,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史学史家就是为历史学家作总结。因此,史学史的价值就在于通过对史学的反思,为后人提供借鉴,指点门径,造就自觉的史学工作者。倘若舍弃这种对史学的反思,历史的研究只能每天从零开始,那也就不会有历史学的任何进步了。以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己任的中国历史科学工作者,如果漠视自身学科发展的历史,缺少这种必要的知识与理论素养,就不能担负起建设现代中国新史学的重任。而对于高等学校的历史学专业的学生们来说,西方史学史更是一门不可或缺的必修课。

学习与研究西方史学史,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19世纪中叶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的产物,也是“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③的结果。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之前,西方史学经历了长期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史学遗产。据我们初步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广泛接触或研究过从古典时代到近代西方各国的著名史家,从中吸收思想资料,作为其创立唯物史观的一个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产生之后,它也应当面对现代人类在历史学及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变革,包括积极地吸取西方史学在史学理论与方法论方面的最新成果。我们以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也应

① 巴特菲尔德:《人类论述它的过去:史学史研究》,剑桥大学出版社1969年英文版,第14页。

②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重版前言,中华书局1962年新版。

③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2页。

当“吸收和改造”现代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就像它创立时那样。因此,学习与研究西方史学史,对于我们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尤其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认识是颇有助益的。

学习与研究西方史学史,对于推进中国历史学的现代化,发展我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也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祖国历史悠久,史学著作浩如烟海,在世界史学发展史上焕发过夺目的光彩。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指导,批判地继承先辈留给我们的史学遗产,这是中国历史学家责无旁贷的职责。但是,中国史学的现代化,无疑也要借鉴与吸收西方史学。因此,同样重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引下,批判地继承自西方古典史学至后现代主义史学等一切有价值的西方史学遗产,也是我们不容忽视的一项工作。只要采取正确的态度,我们就可以从引进的西方史学中获得有益的启示,成为推进我国史学进一步发展的一种借鉴。

学习与研究西方史学史,还为我们了解与认识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提供了一个窗口。要走向世界,就需要了解世界。不仅要了解世界的今天,也要了解世界的昨天与前天。因此,我们在审视风云变幻的当代世界的同时,也应当把目光投向历史,开拓新的视野,以便从更广阔的世界历史的舞台上,寻求全面建设现代化社会的理想方案。不过时下历史学家多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去探求它,而往往忽略从历史学自身这一视角去认识它。从政治的、经济的与社会的发展进程去研究西方历史,固然是十分重要的,但倘若舍弃了后者,是无助于全面而深入地了解西方的历史和现实的。这确如何兆武所说,“对于任何一个历史工作者来说,对以往历史学的理解,其重要性是绝不亚于对历史本身的理解的重要性的。”^①

二、发展阶段与重大转折

在世界史学发展的长河中,西方史学同中国史学一样,也有源远流长的传统。西方史学自古希腊发端迨至今日,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根据我们的认识,它大体可分成如下四个很明显的又各具特色的发展阶段。

1. 古典史学,即古代希腊罗马史学。从追溯神话与史诗的前希罗多德时代算起,至公元5世纪“古典世界”的终结,西方古典史学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形成了颇具影响的西方史学的诸多优良传统,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 中世纪史学。从公元5世纪开始,西方史学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折,至

^① 何兆武:《对历史的反思》,见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究》译序,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页。

14 世纪初兴起文艺复兴运动,其间古典史学的传统中断,基督教的神学史观制约与束缚了史学,史学的发展相对说来显得比较迟缓。

3. 近代史学。由于时代的进步,西方史学自 14 世纪初开始加快了它的进程,人文主义史学、理性主义史学、浪漫主义史学、客观主义史学及其后的实证主义史学等相继发展起来,至 19 世纪史学的兰克时代,已日趋成熟,终于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

4. 现代史学。20 世纪初新史学思潮萌发,日益冲击着西方传统史学的堤坝。大体说来,我们把现代西方史学等同于 20 世纪西方新史学的发展与演变,这是西方新史学不断成长壮大并与传统史学相抗衡又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过程。不过,西方新史学真正成气候,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其时的史学更多地体现出当代的特色了。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西方史学的嬗变中,各种史学思潮交替出现,诸多流派此消彼长,文献浩瀚,史家辈出,形形色色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论像走马灯似的登上了史坛。面对这样一部西方史学发展的历史长编,需要找到一条主线索。这一答案来源于西方史学自身的发展变化,蕴涵于西方社会的深刻变革之中。宏观地看,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史学史经历了如下五次重大的历史性转折,对此,我们可以作简略的表述。



历史女神克利奥

第一次转折,西方史学的创立,发生在公元前 5 世纪时的古希腊时代。在绵延近半个世纪的希波战争中(公元前 492—前 449 年),同仇敌忾的古希腊人以弹丸之邦,最终击败了波斯帝国的倾国之师。此战不仅促进了古希腊城邦制社会的繁荣,而且刺激了他们对古老东方文化的巨大兴趣,希腊编年史由此进入“古典时代”。这个时代,也是古希腊人理性觉醒的时期。新的哲学思想与学说,尤其是普罗太戈拉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对传统的陈腐的思想是一个有力的冲击,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史学也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变革时代中诞生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历史学在西方取得了应有的地位与尊严,并由此酿就了古典史学的兴旺局面。后来,古罗马人继承了古希腊人的史学遗产,古典史学的传统一直延续了一千年之久。

第二次转折,发生于公元 5 世纪前后,西方史学从古典史学的人本主义转向基督教的神学史观。公元 476 年,曾经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倾覆,这在欧洲编年

史上是一个典型的事件,它标志着西方社会奴隶制的终结与封建制的开始。基督教史学,特别是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企图用基督教的神学观念改造古典史学的人本观念。经过基督教史家重新塑造的历史理论,不仅在整个中世纪时代,而且对整个后世的西方史学都发生了长久的影响。但总体上看,由于希腊罗马时代的古典文化被基督教僧侣们所垄断,史学的发展速度缓慢,史学沦为神学的附庸,这一情况也持续了将近一千年。

第三次转折,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开始。14世纪初以来,西方社会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与发展,不仅要用火与剑为自己开拓道路,也要用笔和舌为自己的合理性辩护,从意识形态上向封建主义旧文化发起挑战。这后一方面便是文艺复兴——一次在西方历史上也是人类文明史上发生伟大转折的思想文化运动。其时,欧洲思想家面临的任务之一就是要使历史学“重新定向”,这个任务是由当时的一批人文主义史家来完成的。他们复兴了古典史学的传统模式,并在新时期中发展了这种传统,史学思想又一次把人置于历史发展的中心地位,人文主义史学的出现,揭开了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发展的序幕。

第四次转折,发生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西方资产阶级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尤其是通过产业革命促进了西方社会的深刻变革,近代自然科学的长足进步又为这种变革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到了19世纪,更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高歌猛进的时代,于是历史的进步观念与乐观主义的文化氛围达于极盛。历史学开始专业化,并被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兰克及其学派应运而生,并进而成为19世纪西方史学的主流。但从19世纪末开始,西方社会的动荡引起了思想界的困惑与不安,尼采的失望便是这一时期西方社会与思想界的一种典型的反映。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声更是极大地震撼了西方世界,它唤醒人们丢弃昔日的幻想,正视正在变化的现实。在史学界,传统史学的某些基本观念重新受到了审视,19世纪末那场德国的“新史学派”与传统史学的论争,随后引起了20世纪西方诸国新史学思潮的勃发,历史观念从思辨的向批判的、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转变,就是基于这一现实的社会背景。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方史学仍受到传统史学的强大影响,但重要的是,历史学家在实践中对自己的工作方向产生了与日俱增的怀疑,史学变革的新方向已不可阻止,史学研究的领域发生了重大的转移,兰克的史学传统受到了有力的冲击。

第五次转折,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前后,从此开始了当代西方史学的发展进程。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随着现代社会发展步伐的加快,史学变化的速度也加速了。在古代,这种重大转折往往要以千年计,到了近代,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末西方史学的变革,其间也有四五百年,但在20世纪,时间只过了半个世纪,史学的重大转折就发生了。到了20世纪70年代,当代西方史学又发生了一些新变化。

可见,历史学的新陈代谢同大千世界一样也是不可抗拒的:顺时代潮流者兴,逆时代潮流者衰。昔日的传统史学,倘要在现当代的新史学潮流中立足,就需要审时度势,博采众长,另辟蹊径,寻求出路。如果抱残守缺,就会陷入困境,并将为新的历史观念与方法所取代。历史学的新陈代谢是如此,其他学术文化又何尝不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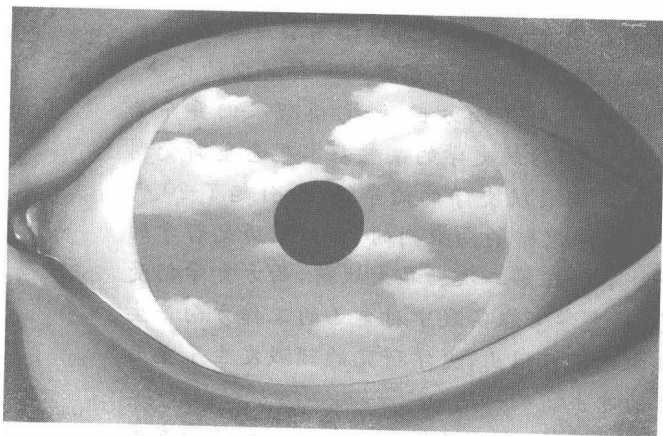
三、西方史学史之史

了解与研究西方史学史的历史,对于史学史自身的发展和史学研究工作的开展,都是不可或缺的。白寿彝说史学史可以从神开始^①,倘此论可立,则“史学史之史”也可以从这开始追寻。以西方史学而论,我们的确可以从古代希腊罗马找到先贤对史学工作的最初思考,从荷马到波里比阿,从赫西俄德到卢奇安;但那是零碎的、偶然的、不自觉的,即使公元2世纪时卢奇安《论撰史》这篇杰出的史论,也不可能是对历史学的自觉的反思,这是时代的局限性使然。

历史学家对历史学自身历史的关注,在西方始于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时代,这是西方史学由传统步入近代的“开闢的大关键”的“第一幕”^②。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法国一些历史学家察觉到中世纪基督教史学和人文主义史学的缺陷已阻碍了史学的进步,于是相继提出了一些新见。这些史家中有鲍杜安(François Baudouin, 1520—1573年)、勒卢阿(Louis Le Roy, 1510—1573年)、让·波丹

(Jean Bodin, 1530—1596年)、波普利尼埃尔(Voisin de La Popeliniere, 1540—1608年)、帕基埃(Etienne Pasquier, 1521—1615年)等。波普利尼埃尔在1599年出版了《史学史》一书,成为西方史学史上把历史学自身作为研究对象的开山之作,但此书不过是一些很松散的史家传记集。此后,仿照此书体例的续作,也多是历史学家的传记汇编。

启蒙运动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也为有关史学自身发展的思



什么是历史?

① 白寿彝:《中国史学的童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关于“史学史之史”等问题,可参见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座谈中国史学史之史》,《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1期。

② 何兆武:《对历史的反思》,见《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译序,第3页。

考注入了新的活力。18世纪后期德国的哥丁根学派不仅在西方史学史上是第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历史学派,而且这一学派的史学家对史学史的认识也有了进步。他们中的一些人,如伽特勒、施洛塞尔等人,主张研究历史也需要探究历史学自身的发展情况,并把这种研究同历史学的相关辅助学科的进展、通史研究等结合起来。不少人也都有过写作史学史的实践。总之,哥丁根学派史家的史学实践,在短短的三四十年的时间里,改变了德意志史学的落后状态,为19世纪德国史学成为西方史学的中心打下基础,为19世纪的德国史坛和其他国家造就了大批历史学专业人才。在历史观念上,哥丁根学派把18世纪后期存在的两种对立的历史思想(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融合了起来,一方面继承了伏尔泰理性主义史学中的“世界主义”观念和文化史的传统,另一方面又积极吸取浪漫主义史学中注重历史的连续性和发展性、肯定中世纪的历史地位等长处,这就使这一学派成了18世纪欧洲理性主义史学向19世纪浪漫主义史学转变的一座桥梁。在历史方法上,他们重视原始史料的搜集辨析,反对抽象思维,倡导专题研究与分工合作,重视历史辅助学科,这就为19世纪以尼布尔和兰克为代表的批判史学奠定了基础。在促进历史学专业化,并使史学逐步向近代科学性质转变的过程中,哥丁根学派的历史功绩是不容忽视的。我们研究西方史学史之史,这个学派应当引起充分的重视^①。

19世纪是西方史学蓬勃发展的时代,在这“历史学的世纪”,出现了像德国兰克那样的一批西方史学大家。西方史学发展到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年)时,不仅历史学趋于专业化和职业化,而且对史学自身的认识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历史学被提升为一门“科学”^②。在这里,我们要特别重申一点,那就是:1824年,兰克出版了《拉丁和条顿民族史》。在该书的附录《对近代历史学家的批判》这篇著名的论文中,兰克运用前辈史家尼布尔处理早期罗马史料的批判方法,对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历史学家马基雅维里与圭恰迪尼的著作,进行了批判分析,指出他们的错误。发表后,引起了西方学界的普遍赞赏与高度评价,它问世的1824年也被学界视为“史学的批判时代的开端”^③。兰克及其学派所奠立的史学批判原则,深刻地影响着后世史学史的发展。

在兰克之后,19世纪英国实证主义历史学家巴克尔在他的《英国文明史》中,

① 参见伊格尔斯:《1760—1860年的哥丁根大学和历史学的演变》,《国际史学史》杂志(英文)1982年第2期。

② 德文“科学”(wissenschaft)一词所包含的意义比英文“科学”(science)一词的意义更为广泛,它除指“系统化的科学”外,还含有“学问”之义。兰克所创立的“历史科学”不仅是总结和预测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科学”,还是认识和理解历史的系统理论和方法,即历史主义的历史研究的“学问”。对此,学界是有不同看法的。

③ 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耿淡如译,商务所书馆1989年版,第179页。

比兰克更明确地提出了史学史的任务,指出每一学科的研究者都应当熟悉本学科自身的历史。其作其论推动了史学史的发展。继巴克尔之后,在德国出版了荷拉维茨的《德国史学史纲要》(1865年)、维葛勒的《文艺复兴以来的史学史》(1885年),在英国出版了弗林特的两部有关欧洲历史哲学的作品(1874年、1894年)等。

进入20世纪,史学史研究更有发展,这方面的作品也不断出现。1911年,瑞士傅埃脱的《近代史学史》刊行;1913年英国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问世,这是一部对19世纪西方史学作出系统总结的权威之作,并由此引发了三部有名的史学史著作的出版^①,即美国巴恩斯的《历史编纂史》(1937年)、美国绍特威尔的《史学史》(1939年)、美国汤普森的《历史编纂史》(1942年)。此外还有意大利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1915年)(其书共两编,其中第二编专论史学史)、德国里特尔的《历史科学的发展》(1919年)等。

二战后,西方的史学史研究内容更为丰富,其中比较系统论述史学史的有两位大家:一是巴勒克拉夫,一是伊格尔斯。

关于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 1908—1984年),之所以在此予以凸显,一是基于他在西方史学史之史中的重要地位,另一原因是他的历史观对中国新时期史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巴勒克拉夫在1955年出版的《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一书中指出,西方史学在20世纪50年代发生了一次“重新定向”^②。这一论见极具新意,它深刻地揭示了20世纪50年代中叶国际史学(尤其是西方史学)的深刻变化,笔者以为自此西方史学发生了一次新的转折,揭开了当代西方史学的发展进程。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该书中所说的我们必须尝试采用“更加广阔的世界史观”^③,到了1978年出版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被进一步界定为“全球历史观”(即“全球史观”)。他这样写道:“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前的主要特征之一。”^④随着历史学家的视野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扩展,盛行于19世纪西方的民族主义史学逐渐为世界主义史学所取代,因之巴勒克拉夫所倡导的“全球历史观”深刻地影响了当代西方史学的发展,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

① 巴恩斯著《历史编纂史》(H. E. Barnes, *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1937年初版,1963年再版,一卷本,至今未见中译本。绍特威尔著《史学史》(第1卷)(J. T. Shotwell, *The History of History*),1939年英文版。1929年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的何炳松、郭斌佳的中译本《西洋史学史》,译自同一作者的“*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History*”一书,1939年出的《史学史》(第一卷)源出于前书。J. W. 汤普森著《历史编纂史》(J. W. Thompson, *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1942年出版英文两卷本。该书有中译本共4册,名为《历史著作史》,译者谢德风、孙秉莹,商务所书馆1988年、1992年版。

② 巴勒克拉夫:《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俄克拉何马大学出版社1955年英文版,第8~10页。

③ 同上书,第133页。

④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42页。

史学界。

说起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 1926—),国内学人大多很熟识。他著述甚丰,堪称当今国际史坛著名的史学史家,中国学者对他著的《欧洲史学新方向》、主编的《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当代史学研究和理论》、《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等,甚是了解,也常常引用,最近又有《德国的历史观》一书中译本的问世。粗读他的这几部大著,一种探讨史学史之史的浓烈的问题意识扑面而来,他在《历史研究国际手册》的“前言”中一开始就这样指出:

本书旨在对历史学之现状作出评估,审视在史学方法和观点上的革新,以及它与古老的学术模式之间的连续性。编者自问:在沟通意识分歧与过去割裂学术的民族传统方面,新方法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或是遭致失败。^①

这里,“作出评估”一词,亦即对史学自身进行自我检讨与回顾总结,这种如同白寿彝所说的史学史研究工作中的自觉性,充分显示在他所写的《历史研究国际手册》一书的“导论”中。这篇从历史学角度看历史研究变革的出色史论,回顾与探索了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历史著作的学术模式直至20世纪法国的年鉴学派和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统,其中无不充溢着这种对前人史学工作的“评估”。其实,他的其他史学史著作也无不贯穿着前面所说的那种浓烈的问题意识,这对于我们的史学史研究,尤其是它的开拓创新,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借鉴意义。

综观伊格尔斯的史学史研究,其中对兰克史学、年鉴派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批判性分析详尽而又缜密,这在他的《欧洲史学新方向》、《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等书中有具体的反映。但在我个人看来,更具学术功力的是伊格尔斯对德国史学传统所作的解释性和批判性的卓越分析,特别是他对“历史主义”的精到的研究,由是观之,他的《德国的历史观》在他的史学史研究中更显著的学术地位,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理论高度。

四、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九十年

中国史学有史,始于20世纪20年代。1920年,李大钊编《史学思想史》。1922年,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1926—1927年梁氏在清华重讲“中国历史研究法”,其讲义以《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问世,书中特别提到了

^① 伊格尔斯等编:《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当代史学研究和理论》,陈海宏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本处译文据1979年英文原版重译。